

伴随文本框架下的元新闻话语研究

李红秀

摘要: 本文基于“伴随文本”理论框架,借用元新闻话语理论的研究视角,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红蓝女记者”事件为案例,广泛搜集围绕该事件的两位女记者的前文本、新闻报道和各种评论的元文本、大量网民跟帖的链文本,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意在揭示新闻界同行、网民对于“红蓝女记者”事件的阐释模式及其现实意义。研究发现:这些阐释性话语存在于新闻危机话语的框架之中,社交媒体积极参与新闻娱乐化的话语生产,而主流媒体沉默不语,非专业性的情绪表达多于理性分析。面对网络舆情事件,主流媒体如何高扬新闻专业性旗帜,正确引导舆论走向,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伴随文本,元新闻话语,红蓝女记者,新闻专业性

Study of Meta-news Discourse within a Co-text Framework

Li Hongxiu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text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news discourse theory, this exploratory research addresses the “Red and Blue Female Reporters” incident. It collects an extensive range of pre-texts, news reports, meta-texts (comprising various comments) and link texts (netizens’ follow-up posts) on these two female journalists. The study casts ligh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cident by news media and netizens and reveal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se interpretative discourses are found to exis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ews crisis discourse. Social medi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entertainment news discourse, but the mainstream media were indifferent, and the incident received more non-professional emotional commentary than rational analysis. In the face of such expressions of public opinion on social networks, how the mainstream media can hold the banner of news professionalism high and correctly guide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research topic.

Key words: co-text, meta-news discourse, Red and Blue Female Journalists, news professionalism

DOI:10.13760/b.cnki.sam.201902009

政府记者招待会是政府部门“邀请记者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特殊会议”，是政府“与媒体和公众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Eshbaugh-Soha, 2003, p. 349）。同时，记者招待会本身也会成为新闻的“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或“热点时刻”（hot moments）。这些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发生之后，新闻人和公众在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讨论和阐释往往极为丰富，为探讨话语实践提供了机会。

提问是记者招待会中最核心的环节。著名记者邵飘萍曾说：“外交记者之交际活动，其最重要之任务为访问。盖一切材料大抵皆从访问而来，则谓外交记者即以访问为任务，亦非过言。”（2008, p. 31）政府记者招待会的提问不仅是对记者业务水平的检验，而且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甚至记者提问的言语和行为举止都可能成为“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某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穿红衣服的女记者提问过于冗长，引发旁边一位蓝衣女记者的不满，她几次扭头向红衣女记者翻白眼。记录了这一过程的一段长达44秒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形成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一个“热点时刻”。此后两天时间内，各种社交媒体参与评论，新闻共同体、观众群、读者群亦就此事展开讨论。本文以此为伴随文本，以“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为理论视角，分析不同主体对这一事件的言说与阐释，继而探寻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记者的素质与新闻职业价值的重构。

一、元新闻话语理论

“元新闻”（meta-journalism）这个词，最早是著名现象学符号学家梅洛-庞蒂用的术语，指大众传播文本编码的主导哲学与理论。（Lanigan,

1990, p. 104) 在当今的新闻传播中,元新闻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指记者在新闻中插入自己的评论,讨论自己写出这篇新闻稿的过程、感想,对采访中受阻拦的抗议(Atton, 2004, p. 53);第二种指大众接受的评判新闻“真理价值”或“道义价值”的种种文化政治标准,是针对某段时期或某个媒体的新闻偏向的研究(Carroll, 2000, p. 41);第三种指大众对新闻事件的讨论和评价;第四种是指公民新闻。第三种和第四种类型的元新闻在新媒体写作中非常普遍。对于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众通过微博、QQ、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表达观点,发表意见,形成公民舆论。新媒体时代,人人是记者,公民利用手机把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拍成视频或图片,及时发布到网上或者朋友圈中,这就是非专业的公民新闻。以韩国推行“阅读者即资讯提供者”“每位公民都是记者”的网媒 Ohmy News 为例,其现有编辑记者 60 多人,市民记者 7 万多人。市民必须通过实名认证方可成为该网站记者,并根据发表新闻的价值、排名位置、点击量等获得相应稿费;作品也可突破传统的新闻报道样式,发挥用户自主性和独创性,书信、对话、自白皆可,文体多样。这种用户创造内容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网站的新闻内容和形式,并促成了 Ohmy TV 电视台的诞生,又让“公民主播”成为可能。该网站现拥有新闻(Ohmy News)、电视(Ohmy TV)、娱乐(Ohmy Star)、图片(Ohmy Photo)、教育(Ohmy School)、博客(Ohmy Blog)等多个板块,被英国《卫报》誉为“世界范围内对本国事务影响最大的新闻网站”(臧丽娜,李欣,2013, pp. 37-39)。

“元新闻话语”理论的首创者是美国学者卡尔森。2014年,他在《过去了,却没有忘记:作为“元新闻话语”的新闻越轨记忆》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解释新闻业变动意义的理论”,元新闻话语在两个维度上界定了新闻业:其一是“寻求建立对可接受实践与行为边界的控制”,其二是“寻求对新闻权威的控制”。有鉴于此,“‘元新闻话语’应该被视为定义新闻业变动的一种永久的阐释性实践”。(Matt, 2014, pp. 33-47) 2016年,卡尔森再度撰文《元新闻话语与新闻业的意义:定义控制、边界工作与合法性》,将元新闻话语视为“一个综合研究行动者如何协商记者作为新闻事件合法记录者的文化权威的分析概念”,继而全面阐释了元新闻话语理论。他首先将新闻业视为一种“依赖语境、通过社会关系进行生产”的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是“对新闻文本、生产这些文本的实践和接受这些文本的条件所展开的公共表达”,它将“行动者”(actors)、“实践场所/受众”(sites/audiences)、“主题”(topic)三个要素连接到“建构定义、设定工作边界和判定新闻业合

法性的过程之中”。元新闻话语就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描述，它可以被定义为对新闻文本、生产实践及接收条件的公共表达，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公开地参与建立定义、设定边界以及判定新闻业合法性的过程。借此，“新闻业内外各种行动者展开竞争，建构、重申甚至挑战新闻实践的边界与极限”。(Matt, 2016, pp. 349-368) 元新闻话语的核心是公众对新闻业的讨论所蕴含的文化意涵，研究者已经将其拿来分析过新闻越轨 (Carlson, 2014, pp. 33-47)、报纸的衰落 (2012, pp. 267-283)、新闻初创公司的创业宣言 (Carlson & Usher, 2016, pp. 563-581)、媒介批评 (Carlson, 2009, pp. 258-277)、媒介把关 (2015, pp. 163-179)、超链接等具体的问题。

2017 年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元新闻话语。研究者往往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来阐释我国新闻界发生的具体的新闻报道个案，或者是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事件。白红义对元新闻话语理论研究得比较精深，他先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停刊为例，研究“正在消失的报纸”的元新闻话语 (2017, pp. 11-25)，接着，又以“今日头条”新闻发布平台为个案，分析算法背后的元新闻话语 (白红义, 李拓, 2019, pp. 30-44)。同时，李娟和刘勇也以“ONE 实验室”解散为例，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研究变动时代新闻职业的价值 (2018, pp. 62-70)。受此启发，本文亦从这个角度来使用元新闻话语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脉络中，新闻业如何建构关于自身的话语，又是如何被其他社会实体进行建构的，以及这种建构将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白红义, 2017, p. 23)

二、作为伴随文本的“红蓝女记者”事件

伴随文本是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赵毅衡先生进一步指出：“在相当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且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 (2012, p. 143)

与此同时，赵毅衡先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广义叙述学》中对元新闻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即关于新闻的讨论与反应。例如某条新闻发出后，收到新闻界，包括国际新闻界的二次报道与批评” (2013, p. 295)。也就是说，对某条新闻做二次报道与批评的内容就是元新闻。

实际上，伴随文本与元新闻之间有着比较强的内在联系。如果把某条新闻看作一个符号文本，那么，对新闻的二次报道与批评就生成了伴随文本，

它们是伴随着某条新闻而生成的新文本。笔者以为，伴随文本的概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元新闻的概念具有现实实践价值，在伴随文本的宏观框架中审视新闻界的热点事件，对元新闻研究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如果把新闻界的热点事件看成符号文本，那么，新闻媒体对热点事件的二次报道和社会公众对它的评价，则既可以看作元新闻，也可以看作伴随文本。新闻媒体、新闻同行和社会公众所进行的集体言说，为元新闻话语研究提供了实践性场域。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集体言说实际上也是由热点事件衍生的各种伴随文本。

以前文提到的“红蓝女记者”事件为例，一般而言，记者招待会的重点是记者提的问题和采访对象的回答，记者本人不是焦点，观众往往也记不住记者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正常情况下，记者招待会中的记者提问只是一个普通的符号文本，很难产生伴随文本。可是，在“红蓝女记者”事件中，当红衣女记者提问时，蓝衣女记者的“凝视”和“翻白眼”让记者成为主角。

视频中，红衣女记者的提问长达44秒，坐在一旁的蓝衣女记者用左手托着下巴连翻了几个白眼，随后头扭向红衣记者，上下打量一番后，用力且充满厌恶地转回头，再次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该视频文本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引来了大量的伴随文本。根据百度指数的舆情分析，搜索“红蓝记者”关键词，可以看到“红蓝记者”舆情指数迅速攀升，在视频传出当日晚间达到6191的最高点，次日舆情指数开始下滑，两天后舆情指数下降到1859点，半个月后舆情逐渐消失。PC端和移动端的舆情走势大致相同，PC端次日达到最高点1315，第三日回落到705；移动端从当日的1163迅速上升到次日的4876，第三日下降为2222。从搜索热词排行中可以看出，“红蓝记者”在舆情热度中始终不减。此外，由“红蓝”衍生的一系列词语也成为网络搜索热词，如“红蓝CP”“自古红蓝出CP”“红蓝大作战”，等等，由这些热搜词生成的伴随文本几乎是难以穷尽的。

三、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伴随文本概念框架，通过对“红蓝女记者”事件的前文本、元文本和链文本三个方面的分析，研究伴随文本对记者招待会的符号表意和传播的影响。同时，借鉴卡尔森的元新闻话语理论研究方法——当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发生后，新闻事件主体、新闻界同行和受众如何积极参与讨论——分析热点新闻事件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本文以伴随文本为外在框架，以元新闻话语理论为具体研究方法，将前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和新闻主体、新闻同行、受众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丰富大众对记者招待会的认识和解读。

赵毅衡先生的伴随文本概念兼具宏观和微观的指导意义。宏观上,伴随文本概念有助于揭示单个符号文本意义的接受和解释与社会文化的动态关系。赵毅衡先生认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2012, p. 143)显然,这些被携带出来的文本就是伴随文本,这些伴随文本积极参与符号文本的意义构成,影响符号文本的生成和解释。微观上,赵毅衡先生对伴随文本进行了逐层细分。他把伴随文本分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普遍伴随文本和深层伴随文本等几大类,又把显性伴随文本细分为副文本和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细分为前文本和同时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细分为元文本、链文本、先文本和后文本。(2012, pp. 143-159)每一类伴随文本均有稳定的指向,同时将伴随文本类型与伴随文本对符号意义生成和解释两个环节的影响明确对应起来,能为具体的符号文本生产和解释提供可操作的指导。比如,我们可以找到“红蓝女记者”的本人身份信息作为前文本,新闻界同行的评价作为元文本,网民和观众的讨论作为链文本,进而对符号文本与其伴随因素共同发送的意义进行解读。

最近几年,国内外学者都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来分析热点新闻事件。卡尔森主要以新闻界对报纸关闭的讨论为分析对象做元新闻话语分析。国内学者白红义也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停刊为例,从报纸、员工、同行、读者四个方面做元新闻话语研究。(2017, pp. 11-25)李娟和刘勇以“ONE 实验室”解散为例,从“ONE 实验室”成员、同行、读者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元新闻话语研究。(2018, pp. 62-70)

同样道理,“红蓝女记者”事件经社交媒体发酵,就成了新闻界的“热点时刻”,为新闻事件主体、新闻界同行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集体言说的机会,各方据此所进行的讨论与分析,为元新闻话语研究提供了实践性场域。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分析和讨论实际上也是由“红蓝女记者”事件衍生的各种伴随文本。

在赵毅衡先生伴随文本理论框架下对新闻文本中伴随文本做具体分类,结合卡尔森的元新闻话语理论和国内学者对热点新闻事件的研究方法,本文拟出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首先,新闻事件的主体是元新闻话语研究的对象,围绕与主体相关的背景材料是生成性伴随文本中的前文本。赵毅衡先生认为,“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称作生成性伴随文本”(2012, p. 147)。生成性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和同时文本。“红蓝女记者”事件中的主体是两位女记

者，她们在新闻事件发生前的各种背景资料就是前文本。

其次，同行对新闻事件的评论是元新闻话语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解释性伴随文本中的元文本。按照赵毅衡先生的观点，解释性伴随文本是在文本生成后出现的，对文本起解释作用的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红蓝女记者”事件发生后，新闻界同行必然进行评论，同行的评论就是元文本，对事件的理解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引领和指向作用。

最后，公众对新闻事件的讨论也是元新闻话语研究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可以看成解释性伴随文本中的链文本。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往往是热点新闻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和传播者，形成各式各样的链文本，比如，简单的评论、转发、点赞、跟帖等。“红蓝女记者”事件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热点，就与网民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量转发、跟帖、点赞、讨论等参与行为密不可分。对“红蓝女记者”事件中链文本的分析，有助于明晰现场直播在记者招待会中的作用。

四、“红蓝女记者”事件的不同阐释

本文将叙事主体分为三种类型：女记者与前文本、同行与元文本、网民与链文本。“红蓝女记者”事件引起新闻界和社会公众的热议，媒体自身、媒体记者以及新闻界同行处在话语场中的核心位置。事件经社交媒体平台大量传播，使得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反应也被纳入其中。“红蓝女记者”事件是一个符号文本，围绕这个事件产生了大量的伴随文本，这些伴随文本叙事角度不同，因而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

（一）女记者与前文本

赵毅衡先生认为，“前文本（pre-text）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狭义的前文本比较明显，包括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广义的前文本，包括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2012，p. 147）具体到“红蓝女记者”事件，两位女记者之前的学习、生活、工作等经历以及她们的言行、发表的新闻作品，都是前文本。

“红蓝女记者”事件发生后，网友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很快把两位女记者的背景资料以及她们曾经的言论公之于众。比如红衣女记者曾自称“放弃了可以成为王妃的机会，独自走上了成为女神的路”。她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介绍为“知名主持人”“瑜伽导师”“Miss China”等，网友对这些头衔议论纷纷。相较而言蓝衣女记者的背景资料比较缺乏，只有供职单位和毕

业院校。不过，网友还是找出了她的一些生活照。两位女记者的各种前文本一时间在网上被大量转发，成为网友热烈讨论的焦点。

(二) 同行与元文本

赵毅衡先生这样定义“元文本”(meta-text)，它是“关于文本的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被接受之前，所出现的评价，包括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2012, p. 148)。“红蓝女记者”事件发生后，势必在媒体行业内引发讨论，经由媒体报道和专业评析实现议题的扩散。通过梳理资料发现，媒体行业对于“红蓝女记者”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主要集中在新闻网站以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笔者并未搜集到太多传统媒体对“红蓝女记者”事件的报道，而一些新兴的数字媒体对事件进行了非传统意义上的报道。所谓非传统意义，除了指发布报道的主体不是传统媒体外，还指报道的形式也不再是规范的新闻文本，而是各方面信息组成的聚合报道。(Carlson, 2016, pp. 135-152)在对“红蓝女记者”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中，事件的舆情发展和记者职业素养成为两个最突出的面向。

“红蓝女记者”事件发生的记者招待会上，谁也没料到蓝衣女记者会对提问的红衣女记者翻白眼，也没料到这几个白眼会迅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成为舆情热点。网民“VICE 死活方式团队”撰写了一篇长文《红蓝狂欢整整 24 个小时了，所以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介绍和分析了事件舆情发生 24 小时的过程。12 点：信息接收；13 点：事件发酵；14 点：事件深扒；15 点：狂欢爆发；16 点：理性回归；17 点：逐渐消声；18 点以后：社会议题。(2018)

对记者职业素养的争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批评蓝衣女记者的白眼缺乏职业道德，另一类是批评红衣女记者提问不专业。网名为“松鼠”的人写了一篇非常专业的文章《如何提问不遭蓝衣记者白眼，看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怎么说》。文章引用了美国记者鲍勃·福尔斯曼的话：“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采访是绝对当不好记者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采访写作课的四点原则：直接(Direct)；开放式问题开头，封闭式问题收尾(Open-and-Closed-Ended Questions)；犀利；简短。文章最后总结道：“CBS 电视台记者 Kevin Rose 和 Charlie Rose 对 Space X 和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采访，值得红衣女记者认真研读。说到底，新闻采访的学问是提问的学问。而记者的职责，永远是不断探索接

近真相。”(2018)

(三) 网民与链文本

按照赵毅衡先生的解释：“链文本(link-text)是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链接等。”他进一步举例：“许多人的网上阅读就是从一篇‘链接’到另一篇，网页文本，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在‘界面’(interface)上提供各种被称为‘微文本’(microtext)的关键词链接、友情链接、评论栏、跟帖等，都是链文本元素。”(2012, p. 149) 社会化媒体时代，网民成为用户，其参与讨论、发表观点变得简单而直接，与专业新闻人一起形成“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通过公共表达来形塑、理解与实践，继而更好地把握新闻业的变动。(Matt, 2016, pp. 349-368) “红蓝女记者”事件中的链文本主要是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的简短跟帖，他们以此表达对该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红蓝女记者”事件发生时，许多网民都积极参与讨论。网民因为教育、品位、兴趣、立场等不同，对该事件的认知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有的观点是对立的。网民“雪域橄榄”说：“任何不尊重他人的人，都不值得尊重，浮夸的表情和浪荡的眼色不是用能力就能掩盖的，越是有能力越应该尊重他人。”网民“美琪”也赞同：“不管怎么说，翻别人白眼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另一派则批评红衣女记者提问冗长，对蓝衣女记者给予支持。网友“姜悦”说：“红衣女记者就是刷自己的存在感，换我也要送她白眼！这么啰嗦，这么磨叽的人，在那么分秒必争的场合，让人讨厌！”

也有一些网友从现场直播的角度来讨论记者招待会的拍摄问题。网友“晓滢”说：“如果摄影师当时看到蓝衣美女翻白眼，应该立即调整机位，不应该让这个画面呈现在大家面前！”网友“巴蒂斯图”对现场直播的摄像问题分析得更专业：“即便要怪，只能怪导播，或者说怪切换，因为现场一定不止一个机位，他们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快速的判断，迅速用其他的镜头代替，是他们反应不够果断迅速，判断不准确。”(转引自松鼠，2018)

与职业新闻人的阐释性实践相比，网民关于“红蓝女记者”事件的言说反而更直接，更鲜明，他们的喜恶表述表面上比较简单，却也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情感。网民对于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都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和心理期待，对于蓝衣女记者翻白眼的原因、红衣女记者提问的冗长等专业话题，都各抒己见，发表了比较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符合规范，但一定程度上代

表示了网民的观点和看法。

五、伴随文本语境下新闻专业性的再造

本文以赵毅衡先生的伴随文本概念为框架，以元新闻话语理论为基础，讨论“红蓝女记者”事件的传播，接下来将具体分析新闻报道内容聚焦的标新意义、新闻事件主体的附加意义，以及链接因素的嫁接意义对“红蓝女记者”事件舆情生成、解释和传播的影响。

卡尔森指出，“元新闻话语提供了一个视角，将相互竞争的行动者、他们说话的场所和所谈论的受众以及所讨论的话题联系起来”（Matt, 2016, pp. 349-368）。本文集中探讨了不同主体对于“红蓝女记者”事件进行的话语阐释。研究发现，这些话语文本依然在新闻业危机话语（crisis discourse）框架中展开，无论是两名女记者的前文本，还是新闻界同行的评论文本以及网民的链文本，都侧重于娱乐化的讨论和传播，而新闻职业素养和新闻专业性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却被边缘化。

第一，不同主体参与有关新闻业的话语生产，新闻娱乐化取代了公共民生问题。

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业的话语生产一直是新闻从业者独享的权力。然而，到了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线人”，人人都是“通讯员”，人人都能生产新闻话语。“红蓝女记者”事件最先在朋友圈刷屏，很快在微博和各大新闻客户端中传播。从热点事件的传播角度来看，虽然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加入了讨论，但是大量的新闻话语是由众多网民参与生产和传播的。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评美国的电视节目：“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2015, p. 106）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娱乐至死”已经越来越普遍，不仅电视节目走娱乐化道路，而且新闻娱乐化也越来越泛滥。“红蓝女记者”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化传播，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严肃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共民生问题。正如潘忠党教授所言：“民主的公共生活并非只关乎政治体制，也不仅仅关乎政府的决策和治理的理性与正当性；它更关乎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时刻面对的基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愿意如何相互关联并展开协调行动？我们希望如何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希望在什么意义体系内相互沟通、理解并共在？”（潘忠党，陆晔，2014, pp. 5-9）显然，网民在社交媒体上

实现娱乐化的情绪表达，而这样的表达却无力解决真正的公共民生问题。

第二，在危机话语的大框架下，社交媒体活跃，主流媒体失语。

泽利泽强调危机的本质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它带来的不仅有挑战，也有机遇。（丁方舟，2015，pp. 6-22）面对新闻危机事件，由于多元主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危机的话语阐释，不同叙事倾向的新闻话语短时间内被大量生产和传播。在“红蓝女记者”事件中，网民和社交媒体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带有调侃和娱乐性的“翻白眼”新闻刷爆网络，而严肃的会议议题却几乎完全被遮蔽。公众的娱乐化表达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社会情绪，背后是公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提升。公众以转发评论或者原创模仿等方式参与传播，这种典型的狂欢行为消费的对象是具体的网络事件和新闻话题。

主流的新闻媒体却对这段“小插曲”视而不见，处于失语状态，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会让网民和自媒体继续狂欢，也会降低主流媒体在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引导能力。

第三，非新闻行业从业者的情绪表达多于理性分析，媒体的专业素养需要在场。

在互联网时代，专业的新闻机构在信息传播层面已经不占优势。正如白红义所说：“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便利了新闻行业之外的新型行动者对以往封闭的新闻运作过程的介入，不仅能够影响到新闻媒体和记者对新闻事件的建构，也参与到新闻社群对新闻界内的行业、职业问题的讨论中来，成为元新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生产主体。”（2017，pp. 11-25）就本文讨论的“红蓝女记者”事件而言，其话语的生成者主要来自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和众多网民，他们的话语并非从新闻专业的立场出发，而多是情感宣泄和情绪化表达，其实质是娱乐化，背后隐含着对传统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

面对社交媒体的舆论冲击，传统主流媒体不能沉默不语，相反，主流媒体机构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主流新闻机构不仅是为受众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良性的新闻传播为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特别是在网络舆情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旗帜鲜明地从专业性角度正确引导舆论。令人遗憾的是，在“红蓝女记者”事件中，主流新闻媒体并没有从专业性角度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助长了社交媒体上的个人用户与非专业新闻机构用户的娱乐化情绪表达。这不仅放大了事情的负面作用，而且逐渐消解了新闻职业的传统价值。由此，专业主义离场，新闻娱乐主义统合新闻职业价值，其结果必然是主流媒体的影响式微，新闻职业素养和新闻专业性被娱乐主义取代。

应该看到，元新闻话语为我们研究记者招待会的相关舆论提供了一种新

的视角,尤其在社交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传统媒体业态与传播生态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元新闻话语不仅是一个意义和实践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各种话语在场而交织的论坛”(潘忠党,陆晔,2017,pp. 91-124)。本文研究的案例虽然是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偶发舆情事件,但聚焦的重点是非新闻专业的行动者为何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的元新闻话语。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主流媒体如何高扬新闻专业性旗帜,正确引导舆论走向,再造自身的舆论话语,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引用文献:

- 白红义 (2017). “正在消失的报纸”: 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 新闻记者, 4, 11-25.
- 白红义, 李拓 (2019). 算法的“迷思”: 基于新闻分发平台“今日头条”的元新闻话语研究. 新闻大学, 1, 30-44.
- 波兹曼, 尼尔 (2015). 娱乐至死 (章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丁方舟 (2015). “理想”与“新媒体”: 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新闻与传播研究, 3, 6-22.
- 李娟, 刘勇 (2018). 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基于 ONE 实验室解散的元新闻话语研究. 新闻记者, 5, 62-70.
- 潘忠党, 陆晔 (2017). 走向公共: 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 国际新闻界, 10, 91-124.
- 邵飘萍 (2008).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 (肖东发, 邓绍根, 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松鼠 (2018). 如何提问不遭蓝衣记者白眼, 看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怎么说? 检索于 <http://wemedia.ifeng.com/52170628/wemedia.shtml>.
- 唐绪军, 黄楚新, 王丹 (2014). 互联网思维下全球新闻编辑部转型与趋势. 新闻与写作, 11, 5-9.
- VICE 死活方式团队 (2018). 红蓝狂欢整整 24 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检索于 http://www.vice.cn/read/24-hours-of-internet-parade?utm_source=tuicool&utm_medium=referral.
- 臧丽娜, 李欣 (2013). 新媒体对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的解构. 当代传播, 5, 37-39.
- 赵毅衡 (2012). 符号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Atton, C. (2004). *An Alternative Internet: Radical Media, Politics, and Creativity*.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arroll, M. T. (2000). *Popular Modernity in America: Experience, Technology, Mythohistory*.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arlson, M. (2012). Where Once Stood Titans: Second Order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 Vanishing U. S. Newspaper. *Journalism*, 13(3), 267–283.
- Carlson, M. & Usher, 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 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4(5), 563–581.
- Carlson, M. (2009). Media Criticism as Competitive Discourse: Defining Reportage of the Abu Ghraib Scand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3(3), 258–277.
- Carlson, M. (2015). Keeping Watch on the Gates: Media Criticism as Advocatory Pressure. In T. Vos & F. Heinderyckx (Eds.). *Gatekeeping in Transition*, 163–17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arlson, M. (2016). Telling the Crisis Story of Journalism: Narratives of Normative Reassurance in Page One. In J. C. Alexander, E. Breese & M. Luengo (Eds.).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From Technology to Culture*, 135–152.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shbaugh-Soha, M. (2003).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over Tim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2), 348–353.
- Lanigan, R. (1990). *Phenomenology of Communication: Merleau-Ponty's Thematics in Communicology and Semiology*. Detroit, MI: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Matt, C. (2014). Gone, But not Forgotten: Memories of Journalistic Deviance as Meta Journalistic Discourse. *Journalism Studies*, 15(1), 33–47.
- Matt, C. (2016). Meta 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 349–368.

作者简介:

李红秀，博士，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巴渝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德瑞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新媒体和文化传播研究。

Author:

Li Hongxiu, Ph. D. ,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umanity,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ayu Scholar, visiting scholar from Drak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new media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lihongxiucq@163.com